

陈平原：压在纸背的心情

给近 30 年中国学界的演进提供一份证词



▲ 陈平原

本报记者任沁沁

如何在时代大潮中，守住中国文化的“根”？怎么做到有所创新、有所转化；既保留本土的历史文化记忆，又避免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著名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日前出版新书《想象都市》《记忆北京》《学者的人间情怀》《当年游侠人》，《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记者与他进行了深入探讨。

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

草地：为何此时出版这四本书，它们之间有无关联？

陈平原：前年三联书店刊行《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那是专门著作，很厚实，自己看着也安心。去年春天，准备将我有关都市的写作结果，可文章长短不一，不适合做成四五百页的大书，于是分成《想象都市》与《记忆北京》两册。

我知道自己的“都市研究”专业性不够，文体驳杂，因其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不断地在学院与民间、拥抱与拒斥、历史研究与现实感怀之间挣扎，一看就是知识分子而非专门家的立场。虽然谈的是城市，背后支撑的却是“学者的人间情怀”，贵编提议干脆把两册读百年中国读书人心路历程的旧书增订重印，这样配合着看，说不定还另有一番滋味。

草地：在您看来，为普通读者而非专门家写作，因而文体上有特殊的追求？

陈平原：是的。在我为《读书》创刊 20 周年撰写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我曾妄加揣测，《读书》的办刊方针，思想上追摹的是《新青年》，文体上神往的则是《语丝》。关于‘语丝文体’，鲁迅概括为‘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周作人则称是‘古今并谈，庄谐杂出’。这种以知性为主，而又强调笔墨情趣的‘学者之文’，半个世纪后，由于《读书》的出现，而被发扬光大：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故作者之进入《读书》，不只需要‘思想’的共鸣，更包括‘文体’的磨合。”（《与〈读书〉结缘》）如此兼及历史与现实、思想与心情、学问与文章，即便一时半会儿做不到，也都心向往之。

像波德莱尔观察巴黎，狄更斯描写伦敦那样理解城市

《想象都市》，将城市作为学术话题，聚焦陈平原对城市学与都市研究的思考与感悟成果。围绕北京、西安、开封、香港等充满历史纠葛和文化积淀的城市，在论文衡史中纵论古今，在都市现状中建言献策，颇见他奉行的“人间情怀”。

草地：您以城市研究作为透视中国的一个重要视角，看到了一个怎样的中国？它的独特魅力是什么？又潜藏着怎样的问题？

陈平原：翻开《想象都市》，打头是这么一段：“同一座城市，有好几种面貌：有用刀剑刻出来的，那是政治的城市；有用石头垒起来的，那是建筑的城市；有用金钱堆起来的，那是经济的城市；还有用文字描出来的，那是文学的城市。我关注这几种不同类型的城市，但兴趣点明显倾向了最后一种。有城而无人，那是不可想象的；有了城与人，就会有说不完的故事。人文的东西，需要不断地去讲述、解说。文献资料、故事传说、诗词歌赋等，这些文字建构起来的都市，至少丰富了我们的历史想象与文化记忆。”之所以特别关注“文学的城市”，不是因为它最重要，而是我比较熟悉，谈起来更有把握。

去年年底，我应邀站在前门箭楼上对着镜头谈北京历史文化，前方是熙熙攘攘的商业街，后面则是肃穆庄严的天安门，平时都是仰望，改为俯瞰，感觉大不一样。可见，你的位置、你的阅历、你的学养，决定了你对北京乃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理解，包括“魅力”多少、“问题”何在。我的任务是把自己的真实感受——连带无知与偏见——和盘托出，这比假装先知先觉、全知全能要好。

草地：城市化是中国还正在进行的一个现象，它带来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伴随着很多问题，比如拆迁，您如何看待这个过程？

陈平原：全世界的城市化过程都不是一帆风顺，往往夹杂着风雨腥风。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哪些是必要的丧失，哪些是本可避免的灾难。中国的野蛮拆迁，确实留下了很多遗憾。不过，应严格区分行政权力滥用与改造方案失误，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们这代人，经历上山下乡，体验过中国城市化的停滞乃至倒退

早年突出学术尊严，后来侧重人间情怀，腾挪趋避中，都

是在与时代对话。既坚守象牙塔，撰写中规中矩的学术专著；

又对已经制度化了的的知识生产，保持一种冷静审视的态度，

这是过去 30 年间我所坚持的学术理念，得失成败均在此

做学问，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活儿。假如将“学问”做成了

熟练的“技术活儿”，没有个人情怀在里面，对于人文学者来

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哀

（城市化率——1959 年 18.41%；1969 年 17.50%；1979 年 19.99%），也躬逢改革开放，目睹了中国城市的迅速发展（城市化率——1999 年 30.89%；2009 年 46.59%；2019 年 60.60%）。同样 20 年，或仅仅增长百分之一，或整整翻了一倍，两种历史场景，我们都是见证者，且有切身体会。既跌至谷底，也见过波峰，我们这一代，应该比未及看到波峰的上一代或想象不出谷底的下一代，都更能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艰难、曲折与辉煌。因此，说话不会走极端。

草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新的建设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陈平原：中国 300 多座地级以上城市，各有自己的历史文脉，也各有自己的现实处境，城市改造及建设方案应因地制宜，最忌一刀切。针对已获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才是“硬道理”。但我深知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压力巨大，而金融与房地产业合成的“推土机”无坚不摧，使得必须花钱的“保护”，远不及能带来 GDP 的“建设”受欢迎。可也正因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不太讨人喜欢，才更需要知识者为其仗义执言。

草地：去过的城市，哪里给您的印象最深刻，请讲讲您和这座城市的故事。没去过的城市，您最想去哪里？

陈平原：在《六城行》中，我曾谈及自己如何在短时间里，辗转于北京、天津、上海、香港、台北、广州这六座中国最为重要的城市，参加关于都市文化建设的学术会议。而这六城又恰好都是可爱的小城流连过，但那都属于游客的眼光，不具有学术性。去年我给中央文史研究馆提了个议案——为了破解“千城一面”等省市文化建设问题，建议中央文史研究馆牵头，各省市文史馆参加，中央和地方文化旅游、教育研究、城乡建设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协助，共同编写“城市读本”。若此计划得以落实，我会走更多中国城市。

草地：《想象都市》这本书的书名有什么寓意，蕴含您心中理想城市的概念吗，它是什么？

陈平原：多年前，为北大出版社的“都市想象与历史文化”丛书撰写总序，我提及：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辈所长与所愿；我们的兴趣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甚至做梦、写作。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而是城与人的关系。虽有文明史建构或文学史叙述的野心，但更希望像波德莱尔观察巴黎、狄更斯描写伦敦那样，理解北京、上海、长安等都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如此兼及“历史”与“文学”，当然是我辈学人的学科背景决定的。

坚持自己的理念，学以救弊

《记忆北京》，以上中下三辑，收录陈平原关于北京的历史、文化随笔，从历史记忆、旅游资源、文学想象等多个维度，试图以想象和记忆的碎片，重构一个精神的古都。

草地：您说，从大历史的角度解读这一两百年来中国的命运，北京是个很好的缩影。北京的“特别中国”之处，在哪里？

陈平原：20 年前，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我提到北京作为城市研究的巨大潜力。西安作为古都，上海作为新城，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可北京横跨古今，更值得深入研究。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加州大学等学术机构通力合作，使得“上海学”成为欧美汉学界的热门话题。上海开埠百余年，其“西学东渐”的足迹十分明显，历史线索清晰，理论框架也比较容易建立。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上海其实是个特例。相对来说，作为古老中国的首都，加上又是内陆城市，北京的转型更为痛苦，其发展的路径也更加曲折，很难套用现成的理论。读读西方关于城市研究的著述，你会感到很受启发，可用来研究北京，又总有些不太适用——在我看来，这正是北京研究的潜力所在。“北京学”必须自己摸索，因而更有理论创新的余地，这里所说的乃是理想的境界。

草地：有人说，住久了，就是故乡。您从广东潮汕来到北京，并把北京当成了第二故乡，这种情感源自什么？在北京学习生活有哪些外地所体会不到的生活趣味？现在您还逛书摊吗？

陈平原：住久了，就是家乡，这句话很简单，但有哲理性。我因机缘巧合，博士毕业就在

北京落地生根，于是有了提倡“北京学”的短文。倘若当初我落户广州或南京，大概也会有此等情怀。多年前，我为《广东历史文化行》写序，其中提及：“当今中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很可能对纽约的股市、巴黎的时装、西班牙的斗牛、里约热内卢的狂欢了如指掌；反而漠视自己身边的风土人情、礼仪习俗以及各种有趣的生活细节。如此看来，单讲‘世界大势’或‘与国际接轨’还不够；还必须学会理解并欣赏各种本土风光——尤其是自己脚下的这一方水土。”在大与小、远与近、内与自己的参照阅读中，开拓心胸与视野，反省自己身上可能存在的盲信与偏执。可以说，这是现代人精神成长的重要途径。”（《深情凝视“这一方水土”》）

所谓“来了，就是某某人”，不该只是各城市主政者的口号或房地产广告，应该成为新旧市民的切身感受与文化认同。作为南方人，我初到北京，确实感觉生活很不方便；但 30 多年后的今天，因居住环境改善以及物流发达，各地生活方式其实差别不大。至于逛书摊，现在基本上不去了，一来年纪大，二来家里书太多，三来常有朋友及出版社赠送，实在需要时，让学生代买就可以了。

草地：北京有太多的名人故居，您觉得如何保护并利用以达到它文化价值的释放？

陈平原：2013 年，我撰写《“城市”怎样“阅读”》，恰好有这么一段话，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以“名人故居”为例，偌大一个北京城，到底能保多少？这里所说的“名人”，是政治家、商人，还是文化人？确定保护名单时，主要考虑建筑，还是着眼人物？是建纪念馆，还是仅仅挂个牌子？所有这些，都必须认真斟酌。我曾在巴黎、伦敦、布拉格、布达佩斯等地寻找作家故居，深知此举关系重大。挂牌纪念，并非越多越好，一代人的判断，须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北京市政协讨论应保护的“名人故居”名单，做了好几年，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我反对“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心态及论述方式，确实需要的才予以保留。另外，我不主张再建鲁迅博物馆、郭沫若纪念馆那样有很高“行政级别”的文保单位，也不认为一说“保护”就必须大张旗鼓，既给编制又给钱，动员民间的力量，参与到此事业中，方是正路。

草地：作为千年古都和现代化国际都市的北京，如何在时代潮流中诠释、平衡好角色，古老而又新鲜？

陈平原：我关于都市的论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城市化进程有很多弊端，但不可抗拒。第二，大城市如何经营管理是个难题，没有万全之计，只能逐步摸索，砥砺前行。第三，政府越来越有钱，城市越建越豪华，但必须坚持以民为本。第四，民众有权利争取更好的生活方式，因此城市的管理者责任重大，而专家则有义务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达成这一目标。第五，“作为学者，我们的责任是说出自己相信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见解；至于领导在不在乎，民众爱不爱听，能不能收获掌声或付诸实践，不在考虑之列。”后面这句话出自我的《六城行——如何阅读／阐释城市》。作为读书人，职位高低与学问大小是一回事，能否坚持自己的理念，学以救弊，又是另一回事。

学问中有人，有喜怒哀乐，有情怀，有心境

《学者的人间情怀》，全书共四辑，从学术视角述说人间情怀，以特定角度见证 20 年来中国学术变迁。陈平原作为文化大家，从自己研究领域出发，融合哲学、宗教、历史等学科，传递出学人对当下社会、人民、社会事件等公共领域的看法和观点。

草地：这本书，是您个人精神探索的印记，也是对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叩问，怎么评价其学术与现实意义？

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带有特定时代的精神印记，说好说坏都有，至今仍不断被提及。刊行《现代中国》第一辑时，我在“编后”中谈及：“越来越精细的学科分野、越来越严格的操作规则，越来越艰涩的学术语言，在推进具体的学术命题的同时，会逐渐剥离研究者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对于人文学来说，这个代价并非微不足道。既投身‘专业化’大潮，又对‘正统派’之得失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以为是有必要的。”早年突出学术尊严，后来侧重人间情怀，腾挪趋避中，都是在与时代对话。既坚守象牙塔，撰写中规中矩的学术专

著；又对已经制度化了的知识生产，保持一种冷静审视的态度，这是过去 30 年间我所坚持的学术理念，得失成败均在此。

草地：您说，人生的意义和乐趣不只体现在这些学术论文上；追求的是成为有学问有情趣的“人”，而不是只会做学问的“机器”。什么样的人，是有学问、有情趣的？

陈平原：有感于奖惩制度催逼下大量涌现的学术论文越来越远离现实人生，我撰写《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2007 年）：“我想象中的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喜怒哀乐，感慨情怀，以及特定时刻的个人心境等，都制约着我们对课题的选择以及研究的推进。做学问，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活儿。假如将‘学问’做成了熟练的‘技术活儿’，没有个人情怀在里面，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哀。所以，我首先想说的是，学问中有人，有喜怒哀乐，有情怀，有心境。”这样的人文学，必定与现实存在某种程度的牵挂与勾连。但我对现实也只是保持“遥远的兴趣”，所谓“观察”与“介入”，仅限民生、教育、出版、文化传播等，属于低调的理想主义者。

草地：这些年来，您以冷静审视的学术理念，在历史大潮中怀揣眷恋与情怀，辨析文化思潮，反思大学体制，追忆学问人生……“压在纸背的心情”是什么？

陈平原：“压在纸背的心情”这句话，如今常被谈论我的人引用。2010 年，我参加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三十年集”丛书，编选了《压在纸背的心情》。为什么这么命名，那是因为：“放长视野，我们这代人的‘阅历’‘观察’以及‘心情’，或许比我们做出来的‘学问’还要有意义。后世的学者，训练、视野以及研究条件都比我们好，但读书时的心情、心气与心境，未必赶得上我们。”为了“给近三十年中国学界的进展提供一份证词”，我编选了这个集子。但最早在哪篇文章提及“压在纸背的心情”，我也忘记了。至于到底是什么“心情”，因时因地因题因文而异，无法一言以蔽之。

“当年游侠人”的气势与襟怀

《当年游侠人》，以随笔形式，表达个人感怀与学术发现，引领读者回到历史现场。该书以上中下三辑，缕述百余年来活跃于思想、文化与学术领域的名家大师，如晚清以来著名文人寄禅、康有为、丘逢甲、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蔡元培、许崇裳、陈寅恪、胡适、许地山、林语堂、成舍我等；以及陈平原师友金克木、唐棣、李镇淮、程千帆、王瑶、金庸等。

草地：晚清以降，中国历经沧桑巨变，一批文化精英至上时代前沿为民族命运鼓与呼，国士之风，慷慨悲烈。兼有政治符号和学术积淀的他们，其精神风范对于后来者有何启发？

陈平原：多年前，我在《与学者结缘》中称，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觅到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实在是一种幸运。由于专业需要，研究者一般必须与若干在世或早已谢世的前辈学者对话。“对话”与“结缘”，在我看来颇有区别，前者注重学理之是非，后者则兼及其人格魅力。大概是天性好奇，品尝过美味佳肴，意犹未尽，又悄悄溜进厨房去侦查一番，于是有了这些专业以外、不登大雅之堂的“考察报告”。《当年游侠人》中所谈论的各位，确实如您所说，其精神风范值得追摹与表彰。但我不希望把他们符号化，而是更关注其言行与著述中隐含着的作者的真性情，或者说某种不可复制的生命体验。

草地：笔下有神，您的文字展现了游侠人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趣味及人格魅力，书中哪一位学人对您个人影响最大？

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书中，我再三强调，晚清一代和五四一代，从人际关系到研究学问，都密不可分。因此，我要求我的研究生必读八个人的文集：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周树人（鲁迅）、刘师培、周作人、胡适。故意不按各自登台表演的时间，而是出生年月排列，您一下子就明白，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学术是如何“犬牙交错”的。私底下，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这句话，包含我对历史情境及文化命脉的理解，对道德激情的把握，以及对启蒙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想象。有人不以为然，有人会心一笑，有人穿凿附会，日后有机会我再认真阐释。

草地：游侠毕竟当年人，当前出现的学术造假等现象，与学风严谨的“游侠精神”格格不入。当代中国需要怎样的治学精神和学术人格？当代学人应如何守正创新，推动社会进步，民族发展？

陈平原：与“学术造假”针锋相对的，应该是严谨、求实、认真、规范的学风，这与“游侠精神”没有什么关系。可以这么说，特立独行的游侠，一定要延伸到学界，那就是力求“创新”；至于是否“守正”，反倒无所谓。之所以这么较真，咬文嚼字，是不希望被眼下的所有需求，都直接投射到历史人物那里。反过来，如果一切以我的立场及趣味为中心，很可能缩小了“当年游侠人”的气势与襟怀。当代中国学人自有来路、意气与阶隘，晚清以降，无数读书人上下求索，其可爱及感人之处，不在那些随时可以撕下的标签，而是那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真诚与痛苦。

书话

理想照亮现实

魏华莹

刘旭峰长篇小说《选调生》以选调生的基层工作为背景，书写了一名大学毕业生在乡镇三年的工作经历，所见识的形形色色人物、现象，面对的爱情与人生的迷惘，勾连起乡镇生活的方方面面。

1965 年，国家开始了直接选配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实践，后因种种原因中断，上世纪 80 年代初又重新启动。几十年来，选调生制度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干部人事制度，致力于为国家选拔优秀的年轻干部，更有千千万万的青年以选调生的身份投入基层工作。但奇怪的是，这一群体在文学中却是长期缺席的，他们的青春、迷惘，奋斗的模样、切实的人生一直是模糊不清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选调生》这部书别具特色。它以许多丰厚的甚至略显琐碎的细节将“选调生”的奋斗史全景式地描摹与还原。

小说主人公丁晨辉 1999 年从大学商学院毕业，对人生充满期待。关于何时到岗，却遭遇人生第一课，“一晃二十多天过去了，没有得到市人事局的任何消息，其间我打了两次电话询问，给的答复依然是等待”。到了 9 月，终于等来了市里的介绍信，到了县里又是一拖再拖，托人找县人事局的书记，才被安排到镇上的岗位。满怀期待来到镇里，又遇到镇里编制紧张。后来又是托人找关系，才被落实岗位。关系网的强大使人无所适从，知识和道理仿佛无用了。在这里，丁晨辉一心想发挥自己的作用，多干些实事，却屡屡挫败，甚至自我怀疑。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这是印在封面的话。这同样是路遥作品《人生》的题记，引自柳青的《创业史》。当改霞在进城还是留在蛤蟆滩举棋不时，柳青满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段人生格言。与改霞处境相似，《人生》中高加林面临两难选择时，这段话也可视为路遥对高加林的人生劝诫。如是，作者也把丁晨辉三年的基层生活，以及通过公派考试，调入市委办公室的人生经历以此寄语，可见其对《创业史》《人生》的敬重，以及对新的时代青年故事的续写。作品中的丁晨辉勤奋、善良、坚韧，有着高远理想和诗意的幻想，渴望在工作岗位上干出成绩，却面临着现实环境的种种挤压。致清叔是这段灰色的时光里有着温情色彩的人物，从踏入工作岗位，一直鼓励、帮助丁晨辉，成为他的引路人，总是在紧要处给予他最真诚的告诫。而他自己的人生却略显苦涩，本来是军转干，但因为档案丢了，始终无法入编、提干，多年后发现县里的干部可能顶替了他的名字和档案，人生就这样被改写。

和高加林的遭遇挫折直至重回黄土地不同，丁晨辉最终离开了乡镇，时隔多年再度重温记忆，也多了一些理性的思考，甚至将其命名为人生紧要处。毕竟，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虽然有着各种坏现象，但在个人努力和周边转徙之下，丁晨辉的人生之路还算顺畅。这和他的坚持有关，也是他对自己人生的理性规划。读完这部书，整体感觉是真实、贴切，细致还原了那些并不诗意的生活。

除了个人的心灵史，作品也写到青年的爱情与友情。作者以史的笔法写出选调生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使他们在庸常而烦恼的生活生出梦想的翅膀，也为读者提供了独特的人生经验和中国故事。

捕星者说

陈智博

吴重生的新书《捕星录》日前出版。李白的“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寥寥几句就写出了人生的高境，星夜之奇妙。“捕星”之意，与“摘星”异曲同工，关乎时间与空间，以文字雕刻时光，它是作者的私人记忆，一本回忆录、游记和人文地图。

这是一本诗集，从中能看出吴重生沉静的思辨、敏感思绪和深刻的思考。如《雪》：“雪／覆盖了故事／所有的情节／沉默不语／雪的家族很庞大／今天统治了整个华北／留出江南一角／给李煜吧／江南的第一片瓦／今晚发出冬雪融化的声音”，这首诗里有家国情怀，有对历史的洞察，亦有对李煜错位人生的叹喟唏嘘。

我们知道，写作永远面对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是由其本性所带来的——如果离开了人类的生活、情感、思绪、土地、命运以及其中相互的联系，那么无论多华丽的诗句也仅仅是流于形式，而缺乏内在意义。对于写作者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敏锐洞察和丰富细腻的人生体验。雷蒙德·卡佛曾说，“尽管你有可能被人看成傻子，但作家要有面对简单事物——比如落日或一只旧鞋子，惊讶得目瞪口呆的能力或资质。”对于诗人来说，更是如此。我在《早餐，偶遇一掃椅子》谈到这样的句子：“室外若那树的倒影／连接着室内的茶香／椅子，我忍不住多看你一眼／是老母亲在昨夜派你来的吧／是我流浪不安的灵魂／用你放置了无数次的踟蹰”，餐厅里的一排椅子，这是任何人每天都要遇到不知多少遍的普通场景，却引发了作者的诗情，作者以椅子的“空”对应彼时内心的“空”，以椅子的承载对应母亲对家庭的支撑。以白描的方式书写对母亲的思念和赞颂。不显山露水，却饱含深情。

无论走到哪里，故乡就是永远背在身上的行囊。吴重生是浙江浦江人，虽然工作生活之地离家乡遥远，但他的诗歌里仍是江南的气韵。这部诗集之中，数量首屈一指的就是诗人为故乡撰写的诗篇。诗集第一首《大运河是条太阳河》的第一句“走上拱宸桥，就像走上故乡的原野”开篇点题。《台湾三日》又写道：“我在樟树树下执教英语／用浦江方言告诉台湾／任众浪喧哗，我自沉吟／故乡不在天涯／俯仰天地，大海千帆向我家”。诗人北岛历尽漂泊后感悟，“汉语，是我唯一的行李”。吴重生在更南的南方，遭遇过曾相识的面孔，他用方言回应喧哗的世界。这样的诗人是可愛的，也是令人感动的。

其实，纵有千言万语，也难写尽作者灌注在这本诗集中的情感。《捕星录》，既是他真情实感的体现，也是他遍历山河的见证，这些诗篇中那些金色的句子和闪光的词语共同构成了诗人生于斯长于斯，并为之自豪的江南。